

司机被批捕，比窦娥还冤？

燕梳楼

相比较于青岛被抽十几个耳光的司机，河北男孩骑行被碾压案的司机更像无妄之灾。

8月11日早晨6时许，11岁男孩跟随父亲参与自行车骑行时，时速一度达到37.2公里，不慎摔倒后被对向行驶中的汽车碾压，不幸身亡。

关于这起案件与责任分析我曾在《[这个教训太惨烈](#)》中有过阐述。显然这是一起多方因素导致的意外事故，恰恰是正常行驶的司机责任最小，最多给予一些人道主义赔偿。

但检方最终还是以涉嫌“过失致人死亡罪”将司机姜永亮批捕。这意味着，此案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交通意外，而是定性为刑事案件。这就不是赔点钱的问题了，而是要坐牢的。

这个结果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，也在法学界引发极大争议。此前公安方面曾通知姜永亮家属到检察院进行民事调解及赔偿，其家人变卖家产凑了20万，打到检察院帐户，准备接受调解。

谁知道检察院最后退回了20万元，并正式宣布以“过失致人死亡罪”批捕。这让姜家瞬间陷入慌乱。姜永亮是个电焊工，本来就是灵活就业者，没什么收入，而且妻子患白血病，母亲还一只眼失明，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。

以前他出工都是搭别人的车，后来别人不让坐了，他就贷款买了一辆几万块钱的长安轿车，没想到却出事了。而姜永亮一出事，全家的生活就陷入瘫痪。他们也尝试联系被害人家属，但始终未能如愿。

被批捕后，律师曾到看守所会见姜永亮。姜永亮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，自己正常驾驶汽车，也没有超速，更无法预见对面车道里突然冲出一个小孩摔倒在他的车轮下，怎么就成了犯罪了呢？

而舆论也对民事变刑事案件表达了质疑。“过失致人死亡”有两个情形：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致人死亡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致人死亡。而从本案来看，姜永亮面对突发意外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所以既不存在

疏忽大意，也不存在过度自信。

那么为什么检方批捕的依据又是什么呢？据姜永亮家属透露，事发道路的定性是本案的关键。由于事发路段未开通，所以事故才由交警转刑警处理。既然是刑警接手，那么就不可能按交通肇事罪来定性了。

那么我们就来说“路”的问题。既然现在以事发路段未开通为依据进行定罪，那么道路管理方是否尽到管理责任呢？据附近村民说这条路已经走了2年多了，虽然未移交通车，但算是事实性通车。

不仅没有设置相关路障，而且交通标识齐全，甚至导航显示也是正常通行。姜永亮既不是第一上路的司机，上路时也未见禁止标识，那么就不应该以道路未开通给他定罪，这对他是不公平的。

而且既然道路未交付，那么无论是汽车还是自行车都应该一视同仁，总不能说禁止通行的一段路，大家都上路了，然后出事了就双标，就把责任推给轿车吧。即使有责任，也是同等责任吧。

如果一定要定罪，作为这起事故中的各方都难辞其咎。首先男孩父亲明知未满12岁不能上路，而且速度还那么快，未做到监护责任，应占主责。其次是因减速造成男孩摔倒的前方车辆，应为次责。

而骑车团队组织者，和道路管理方，至少应承担间接责任。最无辜的是恰恰是开车的姜永亮。现在路政方、施工方，骑行组织者、别车导致男孩摔倒的骑行者，都全身而退，把锅全甩给一个司机？

就因为他开的是四轮车，就是原罪？就因为正好孩子倒在了他的车轮下，他就该倒霉？我能理解孩子父亲的痛苦，但其它相关责任人怎么就完美隐身了？要追责的话，也应该明确责任划分吧。

现在好了，各方把一个最可怜的司机推到午门，就等午时三刻人头点地了。他不进去，一堆人就要进去。问题是，这不公平啊。出去聚餐喝酒，同餐人员出事还要一起承担责任呢。

所以在本案责任划分上，是否应该综合考虑各方的因素，以道路未交付作为判案依据有失公允，尤其是刑事责任判定更应审慎考量，毕竟对于姜永亮一家来说，这也是飞来横祸。

就在2天前，河北又发生一起骑行惨案。一名骑车者在霸州的两辆大货车中间骑行时，因躲避积水惨遭后方大货车碾压。我也在提醒我们公路骑行的巨大风险。

无论是青岛路虎女案，还是骑车碾压案，都引发全社会对于司法案件理与法的深入讨论，也是给我们的司法机关一次听取民意、彰显正义的契机。

当然，也可能限于信息的不对称，我们无法洞悉相关证据链。如果是这样，就请检方公布详细的证据和法律依据，既使民由之，也使民知之。

一次公正的司法判决，胜过千次空洞的说教。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公共舆论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，法律才会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信仰。

人类受制于法律，法律受制于情理。法制不是法学家的产物，而是人们的社会生活的产物，所以法律实践不能脱离公序良俗。

如果刑法权不受限制，那一切正义都可能被架空，而且往往是以正义的名义来架空正义。

